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SSCI) 來源集刊

歷史文獻研究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 編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歷史文獻研究

總第34輯

總第 34 輯

歷史文獻研究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 編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歷史文獻研究. 總第 34 輯/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12
ISBN 978-7-5675-2878-9

I. ①歷… II. ①中… III. ①中國歷史—研究—叢刊
IV. ①K207-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303723 號

歷史文獻研究(總第 34 輯)

編者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
主編 朱傑人
項目編輯 呂振宇
審讀編輯 陳才
裝幀設計 高山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 郵編 200062
網址 www.ecnupress.com.cn
電話 021-60821666 · 行政傳真 021-62572105
客服電話 021-62865537 門市(郵購)電話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網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商務聯西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890×1240 16 開
印張 21.5
字數 439 千字
版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
印數 1100
書號 ISBN 978-7-5675-2878-9/K·425
定價 50.00 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質量問題,請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調換或電話 021-62865537 聯繫)

本刊獲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歷史文獻研究》編輯委員會

編 委(按姓氏筆畫爲序)

王記錄 朱傑人 何林夏 郝潤華 黃愛平
曹書傑 張 濤 董恩林 趙生群 劉永翔
嚴佐之 顧志華 顧宏義

主 編 朱傑人

責任編委 顧宏義

責任編輯 呂振宇

編委會通訊處:上海市東川路 500 號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

郵政編碼:200241

電話/傳真:(021)54345055

網絡地址:<http://www.chla1979.org>

電子郵件:lswxyj2013@163.com

目錄

朱漢民：中國哲學的建構：經典詮釋與義理體認	1
李先耕：說古籍——古籍的年代、範圍	3
廖 群：西周銘文、《費誓》與《江漢》《常武》的互證研究	10
張 帥：論南北朝三禮義疏對鄭學的揚棄	19
朱學博：林之奇《尚書全解》成書流傳考 ——兼論其《洛誥》以下部分真偽	27
錢宗武：朝鮮朝《書》學文獻整理的校勘學思考	35
方笑一：中國古代經解序文形態研究	54
任莉莉：“斟酌於古今之間”：阮孝緒《七錄》分類的內在理路探析	71
燕永成：再論《宋太宗實錄》的編修與流傳	78
李偉國：《（嘉靖）湖廣圖經志書》所錄《全宋文》未收文考	86
朱仙林 曹書傑：《花草粹編》與《花草新編》關係再探	97
高 遠：王鳴盛《蛾術編》中的《宋史》考評	106
楊應芹：戴震整理《水經注》的方法	115
李梅訓：東漢讖緯學者與緯書傳承	123
姚公白：“但曲七曲”之辨	129
曹剛華：清代佛教史籍體裁評述	137
劉國宣：李文藻著述考補	154
黃國榮：民國叢書三論	164
呂友仁 李 森：整理本《儀禮注疏》校點失誤舉例 ——以《士冠禮》篇為例	173
趙生群 王永吉：《史記》校勘札記	188
王瑞來：如此四庫：館臣擅改文獻舉隅 ——以《續宋編年中興資治通鑑》為個案	222
胡秀娟：《朱子語類》成化本與朝鮮古寫本之比較——以卷十四為例	247

杜志强：“六郡良家子”考論	258
肖紅兵：試論宋代御賜神道碑額制度之演變	269
戎 默：宋孝宗立儲事件鉤沉	283
張秀玉：姚瑩的清譽與私囊	294
[日]田中和夫撰，屈明昌譯：評朱傑人、李慧玲的整理版《毛詩注疏》	301
陳 才：神話學視野下的《山海經》新注——評袁珂先生《山海經校注》 ..	307
[美]田 浩撰，劉 倩譯：我與中國研究的不解之緣	313
張家璠：楊子才先生對古今舊體詩詞曲的整理與研究 ——兼論古籍整理人才的培養	323

Principal Contents

Zhu Hanm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Classic Interpretation, Philosophical Realiz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1
Li Xiangeng: On Ancient Books — the Ages and Scope of Ancient Books	3
Liao Qun: The Mutual Research between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Wares of Western Zhou Dynasty, <i>BiShi</i> and <i>JiangHan</i> , <i>ChangWu</i>	10
Zhang Shuai: A Discuss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Deviation for Zheng Xuan's Learning Made by Commentaries to the <i>Three Rituals</i>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y	19
Zhu Xuebo: A Research on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Lin Zhiqi's <i>ShangShuQuanJie</i>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its Sections Following <i>LuoGao</i>	27
Qian Zongwu: On the Sorting of Literature on the <i>Book of History</i> in Korean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ual Criticism	35
Fang Xiaoyi: A Research on the Pattern of the Prefaces to Confucian Classic Exegesis Books in Pre-modern China	54
Ren Lili: "Considering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n Analysis of the Inner Logic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Ruan Xiaoxu's <i>Seven</i> <i>Records</i>	71
Yan Yongcheng: Re-discussing of the Compil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i>Veritable Records of Emperor Taizong in Song Dynasty</i>	78
Li Weiguo: A Research on the Essays in (<i>Jiajing</i>) <i>HuGuangTuJingZhiShu</i> uncollected in <i>QuanSongWen</i>	86
Zhu Xianlin Cao Shujie: A Re-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HuaCaoCuiBian</i> and <i>HuaCaoXinBian</i>	97
Gao Yuan: An Analysis of Wang Mingsheng's Research and Commentary on <i>SongShi</i> in <i>YiShuBian</i>	106
Yang Yingqin: A Study of the Methods of Dai Zhen' Collating <i>The</i> <i>Note on Book of Waterways</i>	115
Li Meixun: Scholars of Confucian Divinatio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Inheritance of Confucian Divinatory Books	123
Yao Gongbai: A Study on “DanQu QiQu”	129
Cao Ganghua: A Comment on the Genre of Buddhist Historical Books in Qing Dynasty	137
Liu Guoxuan: A Supplement to the research on Li Wenzao’s works ..	154
Huang Guorong: Three Comments on Ser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64
Lü Youren Li Sen: Some Examples of the Mistakes of the Revised Version of the Commentary and Sub-commentary to the <i>Etiquette</i> — Take <i>ShiGuanLi</i> For Example	173
Zhao Shengqun Wang Yongji: Collative Notes on <i>ShiJi</i>	188
Wang Ruilai: Unauthorized Alteration of Classical Archives by the <i>Siku</i> <i>Editors</i> — Take the <i>Sequel of Chronicle of ZiZhiTongJian of</i> <i>Song Dynasty</i> as a Case	222
Hu Xiuji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ZhuZiYuLei</i> ’s Chenghua Edition and Korean manuscript — based on Vol. 14	247
Du Zhiqiang: A Study on “Good Sons in Six Counties”	258
Xiao Hongbing: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on the Inscriptions from the Top Part of the Officials’ Tombstones Bestowed by the Emperors in Song Dynasty	269
Rong Mo: The Exposure about Emperor Xiaozong’s Heir Appointment in Song Dynasty	283
Zhang Xiuyu: A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Integrity and Personal Property of Yao Ying	294
Tanaka Kazuo: A Review of the Revised Version of <i>MaoShiZhuShu</i> by Zhu Jieren, Li Huiling	301
Chen Cai: A New Exegetical Commentary to <i>ShanHaiJing</i> in a View of Mythology — a Review on <i>The Collation and Exegesis of</i> <i>ShanHaiJing</i> by Yuan Ke	307
Hoyt Cleveland Tillman: My Life with Chinese Studies	313
Zhang Jiafan: On Yang Zicai’s Collating and Study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the Collation of Ancient Books	323

中國哲學的建構：經典詮釋與義理體認*

朱漢民

[摘要] 中國哲學是一門既具有人類哲學普遍性，又有中國文化特殊性的學科，中國哲學是以中國文化獨特的方式建構起來，它的形態是一個歷史的建構過程。中國哲人通過經典詮釋、義理體認而建立的理論體系，能夠充分體現出中國人對宇宙、社會、人生的根本思考。

[關鍵詞] 中國哲學 經典詮釋 義理體認 歷史建構

我在從事中國哲學的研究過程中，逐步形成了有關中國哲學學科的一些看法。

第一，“中國哲學”是一門既具有人類哲學普遍性、又有中國文化特殊性的學科。

“中國哲學”作為一門學科，通常認為只有百年歷史，在當代還受到身份“合法性”的懷疑。但是，我們仍然相信這個基本前題，即哲學是人類對宇宙、社會、人生等根本問題的關注與思考而建立的理論體系，他本是人類各民族的一種普遍性精神現象，表達出人類的普遍性精神需求。那麼，作為5000年中華文明組成部分的“中國哲學”，其歷史的存在是無庸置疑的。但是我們也得特別注意，我們的先賢是用一套自己的學術術語或科目，來表達中華民族對宇宙、社會、人生等根本問題的思考，並且建立了一套相應的理論體系。他們曾經以“道學”、“玄學”、“義理之學”、“性理之學”、“身心之學”、“理學”等等學術科目，命名今天所謂的“中國哲學”。所以說，“中國哲學”既存在於中國學術文化的脈絡中，又表達了人類文明的一種普遍性哲學精神。

第二，中國哲學是以中國文化獨特的方式建構起來，它的形態是一個歷史的建構過程。

“中國哲學”並不是一種固定的學術形態（如諸子學、玄學、理學），而是一個歷史的建構過程。中華文明在兩千多年前的“哲學突破”時，就開始形成獨立的哲學思考。從春秋時期開始，“中國哲學”的獨特形態就一直處在具有內在理路的歷史建構過程中，產生了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清代漢學，等等。只是到了近百年，原本具有內在理路而獨立發展的諸子學、經學、玄學、理學，因為與西方的哲學相遇，故而有了一個讓中國傳統的“道學”、“經學”、“玄學”、“理學”與西方哲學作比較的機會。我們急切希望自己的“道學”、“經學”、“玄學”、“理學”獲得一種人類普遍哲學的身份，如是開始了參照和類比西方哲學模式的“中國哲學”的重建。其實，西方哲學並不具人類普遍哲學的身份，所以，對西方哲學的簡單類比並不能完全讓中國的“玄學”、“理學”就輕易地獲得一種人類普遍哲學的意義，當代學界並不滿意近代以西

* 本文是作者即將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經典詮釋與義理體認——中國哲學建構歷程片論》一書的自序。

方哲學為藍本而建立起來的中國哲學，這種研究模式使中國哲學學科缺少中國文化的特色。但也不是回歸傳統的“玄學”、“道學”、“理學”、“義理之學”、“性理之學”，這些傳統學術的形式、內容和方法更是早已經存在，勿須我們“重建”。我們相信，當代中國哲學的建構，應該是一種既堅持中國文化主體性、又積極參入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和對話的哲學建構活動。

那麼，這種“中國哲學”具有哪些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呢？它又是如何在歷史中建構起來的呢？

首先，是經典詮釋。經典詮釋既能夠體現中國哲學的文化特殊性，又是中國哲學能夠實現歷史建構的根本途徑。中國哲學家的哲學創造並不體現獨立撰寫自己的哲學著作，而是從事經典詮釋的工作。先秦諸子既是“六經”的詮釋者，又是中國哲學經典的創造者，漢代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等思潮中均產生了中國思想史上最具有思想創新的哲學家，但是，他們的思想創新並不體現獨立撰寫自己的理論著作，而是從事經典的注釋。譬如，孔子對《五經》的整理和詮釋，王弼對《周易》、《論語》、《老子》的詮釋，朱熹對《周易》、《詩經》、《四書》的詮釋，奠定他們作為哲學家地位的正是這些對古代經典的重新注釋。他們是通過詮釋經典，最終建構出“義理之學”、“玄學”、“理學”的哲學體系。

其次，是義理體認。古代中國人建構哲學思想體系的出發點不是那個獨立於人的宇宙存在，關注點也不是世界的普遍本質與規律，他們的思想出發點是實現天人合一的過程，其哲學關注點是人的參贊宇宙進程的實踐活動。古代中國的哲學傳統更為關注實現天人合一的生活實踐與操作程式，而並不特別在意知識應如何認識宇宙世界的存在和本質，中國哲學傳統的著重點不是世界是什麼，而是人應該怎樣。故而，中國古代哲學家通過詮釋經典時而建構義理，總是與他的自我體認聯繫在一起的。譬如，王陽明的“心即理”的哲學形上學，並不是建立在“我思故我在”的邏輯思辨的基礎之上，而是他在“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的實踐工夫中體認出來的。王陽明在生活實踐中體悟到並宣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工夫論，故而才有“心即理”的本體詮釋。

上述看法，只是我個人對“中國哲學”學科的一點淺見。多年來，我寫下一些關於中國哲學的文字，主要是關於中國哲人的經典詮釋、義理體認，以及通過這種方式從事中國哲學的歷史建構。我認為，中國哲人通過經典詮釋、義理體認而建立的理論體系，能夠充分體現出中國人對宇宙、社會、人生的思考，使得“中國哲學”是一門既有人類哲學普遍性、又有中國文化特殊性的知識體系。

所以，我將這些論著彙集出版時，命名《經典詮釋與義理體認——中國哲學建構歷程片論》。這本論文集的第一輯主要涉及當代中國哲學的建構，後面四輯論文，則是中國哲學歷史建構的探討，涉及的時段主要有先秦、魏晉、宋明、晚清四個階段。全書的主題就是通過對中國古代經典詮釋、義理體認的研究，以探討中國哲學的歷史建構過程，並涉及當代中國哲學建構應該如何既堅持中國文化主體性、又積極參入全球化文化交流等問題。

（朱漢民，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

說 古 籍

——古籍的年代、範圍

李先耕

[摘 要] 本文首先界定了什麼是古籍，指出其與文獻、檔案的異同，並對其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指出，古籍的上限要超越先秦諸子私學產生的年代直至夏商周三代簡帛使用的年代，而其下限一般是五四之前，但也可以延長至民國時期用文言文書寫並具有傳統著述樣式的書籍。

[關鍵詞] 古籍 範圍 年代

古籍就是古代的書籍。用黃永年先生的話說，“‘籍’在這裡就是書，‘古籍’是古書的雅稱”^①。《漢語大詞典》所引的早期書證是南朝宋謝靈運《鞠歌行》：“覽古籍，信伊人。”我們用“中國基本古籍數據庫”以及《四庫全書》全文檢索版所查到的書證是魏收《魏書》卷八十四列傳儒林第七十二的《陳奇傳》：“（陳）奇冗散數年，高允與奇讎溫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以及同書卷一百八十二志第十一：“輒訪引古籍，竊有未安。”此三證可提示我們，“古籍”一詞似始用於南北朝時期，也就是公元五世紀。相比之下，“古書”一詞的使用年代似乎更早，在漢代就有“古書”一詞，除了表示古文《尚書》之外，也用來表示古代的典籍。《漢語大詞典》所舉的早期書證是晉葛洪《抱樸子·鈞世》：“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我們檢索則以《論衡》為早，其卷第二十九《案書篇》：“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

一

圖書或書籍的定義很多，比如為了方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行國際間的圖書發行統計比較，1964年11月在法國巴黎舉行的會議上，提出並通過採用以下定義：圖書是不包括封面和封底在內，至少含49頁的非期刊類印刷品，並且於該國家公開予公眾。這一定義後來確認為：凡由出版社（商）出版的不包括封面和封底在內49頁以上的印刷品，具有特定的書名和著者名，編有國際標準書號，並有定價並取得版權保護的出版物稱為圖書。這顯然是在印刷術以及書坊、書鋪發展而來的出版單位形成之後的定義，是商品經濟充分發達之後的產物。去掉那些包裝，我們可以看到這裡的圖書是指有一定篇幅的用於買賣交易的正式

^① 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3頁。

著作。而所謂“國際書號”，從 1967 年英國在惠特克(Whitaker)公司成立了標準書號(SBN: Standard Book Number)中心，到 1971 年國際標準化組織批准了國際標準書號在世界範圍內實施，更是最近才發生的事情。但我們不得不說這是符合今天社會的認識的。比如今天的高校在職稱評定或院校評估時，會要求所謂的書、文、獎、項。其中的書大概也符合上述定義。當然其具體所指一般是指專著，有時還會有教科書(教材)、翻譯書籍……等等。而“文”則是指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這種對出版物的分類是今天體制的要求，而並非本文要探討的範疇。

劉國鈞先生在《中國書史簡編》中強調了書籍的傳播知識供人閱讀的功能。他說：“書籍是人們自覺地爲了傳佈知識的目的而以文字寫在具有一定形式的材料之上的著作物。”他還說：“書籍起源於記錄和檔案，而記錄和檔案並非就是書籍。”^①我們基本贊同這些意見。但此書還有一些含混的說法，一方面書中正確地指出，“正式的書籍，就是指用文字寫在或印在具有一定形態的專用材料上以借人閱讀爲目的的著作物”。而“我國最早的正式的書籍是用竹片或木板作的。”^②我們以爲，劉先生的上述觀點是很有價值的。但另一方面，書中又說，“我們把春秋以前的書籍稱爲初期的書籍”。而初期“書籍的材料還不是紙，……首先有甲骨，隨後有青銅，再後有石頭，然後是竹木。”^③書中認爲，甲骨卜辭、青銅器銘文以至石鼓文之類的石刻都“有書籍的作用”，而“刻石是專門爲了宣傳的，它以供人閱讀爲目的，石頭本身並無特別用途。這已接近於正式書籍了。”^④我們以爲，既然命名爲“早期書籍”，那也是屬於書籍的範疇，但這顯然與書中對書籍的定義矛盾，這些文字及其載體不如以早期文獻、檔案之類名之。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儘管目前出土的簡牘最早也是戰國中期的，但這並不意味著簡牘始於此時。簡牘所用的載體——竹簡、木牘，原始人群就可以製作。毛筆出現也很早，新石器時代的陶器紋飾，比如半坡遺址中的彩陶紋樣，就是用毛筆繪製的。既然用毛筆繪製，那必然也會有流體顏料，也就是後世墨的前身。目前多數古文字學家認爲，甲骨文時代就有簡冊。一些甲骨上有用毛筆寫出的字跡，而甲骨顯然並不適於書寫，相比之下，簡帛更適合於書寫。在文獻中，《尚書·多士》記載說：“維殷先人，有冊有典。”甲骨文中“冊”字，正像編連的竹簡。但是我們没能發現殷墟竹簡，那應該是竹木容易腐爛的緣故。我們不能因此就否定《尚書》的記載。

黃永年先生反對把甲骨卜辭、青銅銘文以至碑刻看成書籍。他說：“有人談我國書的歷史，說最早的書是刻在甲骨上的，以後是鑄在青銅器上的，這就不對。殷商時龜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後刻上去的卜辭，並未構成書。商周時青銅器上的銘文即所謂‘金文’是王公貴族們對鑄器緣起的記述，儘管有時爲了誇耀自己的功勳，文字很長，但其性質

① 劉國鈞著，鄭如斯訂補：《中國書史簡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1年，第14頁。

② 劉國鈞著，鄭如斯訂補：《中國書史簡編》，第20頁。

③ 劉國鈞著，鄭如斯訂補：《中國書史簡編》，第15頁。

④ 劉國鈞著，鄭如斯訂補：《中國書史簡編》，第20頁。

仍和後世紀功頌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書。”^①黃先生還認為，殷商之時雖有典冊，但“但這種典冊在當時仍不是書，而只是詔令之類的文字，保存起來猶如後世之所謂檔案”，只有“到春秋末戰國初，學術文化從祝、史手裡解放出來，孔子以及戰國時的學者才把過去積累的檔案文獻編成《詩》、《書》、《禮》、《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講解。這些教材叫做‘經’，講解經的記錄編寫後叫做‘傳’或‘說’，經、傳、說以外的記載叫做‘記’。同時，戰國各個學派即後人所謂先秦諸子也有不少論著，並出現了自然科學技術方面的專著。這些經、傳、說、記和先秦諸子論著、科技專著才是我國最早的書，最早的古籍。”^②

前文已經說過，我們贊成檔案不能算作書籍的觀點。但這並非是其內容不同，而是其功能與形式不同。比如原來清宮大內以及其他地方所藏的檔案，現在收藏在中國歷史第一、第二檔案館，這當然只是檔案而不是書籍。但民國時出版的《清代文字獄檔》（現在有上海書店重印本、整理本），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版的《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以及即將出版的《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彙編》則屬於書籍。同樣殷墟甲骨文卜辭可以看作殷商王室檔案之一種，但《鐵雲藏龜》、《殷墟書契前編》等却是書籍。青銅器銘文以及石刻本身也不是書籍，但是《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兩周金文辭大繫》以及文物出版社的《石鼓文》《張遷碑》等法帖確是書籍。我們以為書籍和檔案文獻的不同首要就在於它的社會傳播性與人際交流性，也就是說，書籍不僅僅是用文字表達意見、知識、思想、感情等內容的載體，而且要把它傳達給別人並與別人交流。魯迅先生在《而已集》的《小雜感》中說過：“人感到寂寞時，會創作；一感到乾淨時，即無創作，他已經一無所愛。創作總根於愛。楊朱無書。創作雖說抒寫自己的心，但總願意有人看。創作是有社會性的。但有時只要有一個人看便滿足：好友，愛人。”^③這裡的“楊朱無書”，是說楊朱既然“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肯，自然也不肯寫書了^④——書是給別人寫的。即便當世無人欣賞，也可以像司馬遷那樣“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人”就是後世那些能够理解他著作的人。

二

黃永年先生所強調的春秋末戰國初從“學在官府”到私學興起的轉變當然很有意義。但是學在官府也意味著“唯官有學”“唯官有書”。孟子說的夏商周三代皆有學，即使以周代的官學而言，官學既有如大司樂、師氏、保氏這樣的教師兼官吏，也有國子等學生，自然也有書本教材。儒家的經典固然與孔子有關，但我們不能贊成一些經學家認為六經為孔子所作的觀點。因為孔子自己說過，他是“述而不作”的。晉人杜預注《左傳》三次用“古書”釋義，

① 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第3頁。

② 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第3—4頁。

③ 魯迅：《而已集·小雜感》，《魯迅全集》第3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532頁。

④ 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說：“時又有楊朱，主‘為我’，殆未嘗著書。”

僅錄於下：

《春秋經傳集解》襄四第十七：“仲尼曰：‘《志》有之。’”杜注：“志，古書。”

可見這是孔子引古書，這一古書絕不是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先。

《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二十三：“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杜注：“皆古書名。”（現在一般都以為這些是古史一類的書籍。）

《春秋經傳集解》昭七第二十六：“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杜注：“《鄭書》，古書名也。”

綜上所述，杜預所注的“古書”絕不僅僅是檔案。

再如《詩》經過孔子的整理，但是《國語》記載，孔子之前，其八世祖正考父就曾經“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可見《詩》這本書在其流傳過程中經過多次的修訂。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要他兒子好好學《詩》。《左傳》也記載了許多朝聘盟會時大夫“賦《詩》言志”的事例。顯然這些人都曾以《詩》為教材認真學習過。我們不能只承認私學的教材是書籍，而否認官學的教材也是書籍——因為二者的形式與功用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事實上，私學源於官學是秦漢學術界的普遍認識。《漢書·藝文志》在論述各個學派時說：“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眾所周知，班固的論述源於劉向、劉歆父子，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上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這說明漢代的學術界公認諸子的“私學”出於先前官守之“官學”。先秦的韓非也主張說，在廢除私學之後，要“以吏為師”，也就是回復以前的官學。既然私學源於官學，那麼私學教材源於官學教材也就是必然的了。

如前所述，書籍的正式形式是從簡帛開始的，然後纔有紙本。而且先有抄本，後有印刷本。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書籍及其同義詞幾乎都是來源於簡帛時代。在《同義詞詞林》中，書籍有下列同義詞：書本、書、圖書、經籍、本本、書冊、縹帙、湘帙、縹湘、卷帙、芸帙、芸編、青編、青簡、黃卷、汗簡。這裡的簡、冊、編、帙、汗、青、卷、經、本均來源於簡帛或簡牘時代（編好的簡冊收藏時要卷成捆，也就是卷，後來沿用到紙本），如帙為古代以布帛製成竹帛書籍的套子；縹湘都是絲織物，縹是青白色，緗是淺黃色，古人常用以為書籍封皮、封套，“縹緗”遂為古代書籍代稱。“本”字如何指書籍暫時還不清楚，但漢代已有如此用法的實例，如劉向《別錄》云：“讎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漢代書籍只是用簡帛，所以這裡

的本也只能指簡冊。上述字詞中只有“芸”，即芸香，是紙本時代用來防蛀的。舊瓶裝新酒本來就是漢語詞彙發展的規律之一。

必須補充的是，本文所說的書的材質是由簡帛到紙，而非金石。但是後世却有利用金石把原來簡帛或紙本書籍複製——當然是爲了某種目的而複製——的例子。這方面最有名的當屬石經。從漢熹平石經、魏正始三體石經直至保存至今的唐開成石經、清乾隆石經。熹平石經豎立在洛陽太學，《漢書》記載說：“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可見其起到了標準文本或規範文本的作用。唐代道觀的道德經碑刻以及房山佛教石經都是出於保存文獻或弘揚宗教的目的，在一定意義上也相當於古籍的一種版本。

三

“古”是一個相對於今的概念。《說文解字》云：“古，故也。從十、口，識前言者也。”而“臣鉉等曰：十口所傳，是前言也。”段玉裁也解釋說：“識前言者，口也。至於十，則展轉因襲，是爲自古在昔矣。”而中國早期的學術傳承特點之一便是尊崇古代，如孔子所言“信而好古”。

春秋戰國的學者會把古代分爲上古、中古、近古等階段。如《易·繫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這是指文字出現以前的遠古時代，也就是今天歷史所稱的史前時期。《易·繫辭下》：“《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這顯然是夏商周三代之時。韓非的說法略有不同：“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韓非子·五蠹》）韓非的說法用今天的觀點來解釋就是文明社會（階級社會）產生於中古近古之際。這也應是古籍起源的年代。

“古”用到各個專門術語時所指的含義是各不相同的。經學與文字學上的“古文”原來是漢儒用來稱呼他們認爲是孔子所用的比籀文還要古老的文字，今天的考古發現證明這其實是戰國東土六國文字。傳統音韻學上的“古音”“今音”分別是指先秦古音和隋唐之音。詩律學上的“古詩”或“古體詩”是指魏晉南北朝之詩或唐宋之後的非格律詩。而“今體詩”或“近體詩”是指唐以後形成的格律詩以及其後遵循其格律而寫作的詩歌。文體上的“古文”則隨時代作者的不同而不同，有唐宋古文運動的“古文”，這大約是針對駢體文而言的。而明清的“古文”則是針對“時文”也就是八股文而言的。所以不同時代的“古籍”或“古書”其概念並不一致。我們所要研究的當然是今天學術界的說法。

古籍的年代下限，許逸民先生在他的《古籍整理釋例》中曾有所討論，我們就以此爲出發點來繼續探討。

冀淑英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後記》一文中說：“1977年1月文物局在北京召開善本書

目籌備會，聽取北京地區部分同志的看法和意見，同年 4 月文物局在北京召集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同志座談，討論研究有關書目的著錄條例、分類法和收書範圍等項問題。6 月份文物局再次召集座談會，討論了分類法等事項。後由文物局王冶秋局長作出決定，書目分類用“四庫分類法”，可酌加修訂，收錄各書下限至清末 1911 年。”^①

黃永年先生 1985 年在《古籍整理概論》中說：“春秋末戰國時編寫撰寫的經、傳、說、記、諸子書等是古籍的上限。下限則一般劃到清代末年。這和史的分期有點不同。我國歷史現在一般從有史以來到 1840 年鴉片戰爭之前算作古代史。鴉片戰爭以後，我國封建社會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下，逐漸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以 1840 年以後的歷史就劃入近代史。但社會性質的變化，並不意味著學術文化馬上統統起根本性的變化。從 1840 年到辛亥革命清朝統治結束的七十年間，新撰寫的書籍中，絕大部分的內容或形式都和前此的古籍沒有多少不同。因此，把清代末年作為古籍的下限要比 1840 年作為下限來得合適。當然，這個下限仍舊是粗綫條的。即辛亥革命以後的著作如果在內容或形式上沿襲前此的古籍而並未完全另起爐灶，如對古籍所作的舊式校注或舊體詩文集之類，一般仍可劃入古籍範圍。採用新體裁對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釋，才不叫古籍，而算作對古籍的整理研究。”^②

文化部 2006 年發佈的《古籍定級標準》，其關於古籍的定義是：“中國古代典籍的簡稱。主要指書寫或印製於 1912 年以前的漢文古籍。”

上述劃定的下限是清王朝滅亡(1911)中華民國成立。

許逸民先生提出“兩項基本條款：(1)1911 年辛亥革命以前編撰(著作、編述、鈔纂、注疏等)出版(寫、抄、刻、印)的各類圖書，均屬於‘中國古籍’範疇。(2)1911 年以後至 1919 年‘五四’運動以前編撰出版的各類圖書，凡內容涉及中國古代學術文化，採用傳統著述方式，一般具有古典裝幀形式(通常為綫裝)者，也屬於‘中國古籍’範疇。”而“中國古籍”還應包括“(3)用少數民族文字書寫的古籍圖書；(4)外國人在古代中國撰寫的著譯，或與中國思想學術有密切關係的外國著譯圖書。”^③

這裡的年代下限放寬到了 1919 年五四運動之前(估計是因為新文化運動開始賦予白話文以合法地位)。當然還有傳統著述方式、古典裝幀形式的限制。其實我們以為，無論是這兩個限制條件，還是年代下限都是可以適當放寬的。我們僅舉兩例：

一是“同光體”，這是以前鄭孝胥、陳衍、陳三立、沈曾植、袁昶等為代表的清季文學流派，較完備的中國古代文學史應該提及，錢仲聯等先生編著的《清詩紀事》也收錄了陳衍等人。看看他們的生卒年，除了袁昶(1846—1900)是死於民元之前外，其餘諸人皆卒於民元之後：陳衍(1856—1937)，鄭孝胥(1860—1938)，陳三立(1859—1937)，沈曾植(1850—1922)。而

① 冀淑英：《中國古籍善本書日後記》，《北京圖書館館刊》1996 年第 2 期。

② 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第 4—5 頁。

③ 許逸民：《“中國古籍”、“古典文獻”和“古籍整理”的界限說》，《古籍整理釋例》，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第 234—235、237 頁。